

# 《跨世紀的大專語文教學》序

鄧仕樑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十八世紀中葉以來，香港由南中國的小漁港發展為現代工商業城市，進而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這一百五十年間，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的轉變，人力資源也不得不作相應的配合。香港是優良海港，地處交通要衝，但在當今之世要保持競爭力，惟有依靠人力資源，因此人才的培養，成為多年來香港各界人士最關注的問題。

過去半個世紀，香港在教育方面經歷了重重改革。今年(2000年)五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委員會作出了新的改革方案，名為「廿一世紀教育藍圖」，就香港的教育問題作了檢討和前瞻。方案涉及的範圍非常全面，自幼兒教育、九年基礎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以至持續教育，都在改革藍圖之內。許多問題目前仍在諮詢階段，而爭議滋多，與其說是由於香港教育百廢待舉，不如說是與時俱進，正顯示了香港人對教育問題的關注。

教育必須配合社會發展。社會變化既亟，教育體制和有關措施必然受到衝擊。推行相應的改革，並不表示可以否定過去種種努力和成就。整體來說，在當前香港這個多元化、資訊化的社會，各界能夠維持相當效率的運作，教育的成果和貢獻，是不可忽視的。語文教學，其實正當作如是觀。

近年社會人士對香港學生的語文水平大感憂慮。這當然不是沒有所見，但所謂水平低降，到底是指每個人的水平都下降了，還是指達到一定水平的人數不足呢？如果說每個人的水平都不如過去十年二十年，可能是用了當時的標準去衡量今天的學生，恐怕不一定公平，因為語文水平繫於天分和努力，天分高，肯努力的人，無代無之，好學生不會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今天香港儘管不少人寫出來的東西教人不忍卒睹，但仍然有優秀的作者，其成就無愧於前人。再者，倘若說每個人水平都低降了，那只是簡單的文化退化論：文化永遠在倒退之中，一代不如一代。果真如此，我們就不必去想甚麼對策，因為甚麼對策都沒有用。

文章寫不通的讀書人，本來歷代莫不有之。通與不通的讀書人，今天恐怕比例還是差不多，不通者絕對數字特別高卻是事實。香港早已由九年免費基礎教育發展到大部分學生完成中學階段，而教育普及的結果，使適齡青年進入大學的比率，由二十年前的約

百分之三，到今天增加到百分之十八。量變造成質變，大學生在學業表現上水平普遍下降，原是無可避免的。因此，一般人說的語文水平低降，應該是指在當今教育體制下培養出來的學生，達到一定水平的人數大大不足。不過這個現象，正好說明當今社會對語文能力良好的青年需求增加。我們儘可慨嘆今天不少青年寫不出通順的白話文，用起英語錯誤百出，可是不要忘記，在三四十年前，這一班青年，可能懂得沒有幾個方塊字，英語更是一竅不通。當然社會不斷進步是合理而正常的，我們不該以此自滿，卻有必要認清處境，針對問題所在，在教育體制、課程設計、師資培訓、教材組織、教學方法各範疇作深入的研究，以期有所提高。

就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學來說，今天面對的問題，是錄取的新生，不少收進來時水平不高。理解和表達能力欠佳，自然成為學習的障礙。另外應當關注的，是中文在香港社會肯定日益重要，大學生要是到了畢業語文能力還沒有改進，就不足以應付各行各業的需求。至於英語，香港的大學生也必須維持一定的水平，不然在大部分專業都不易應付裕如。

語言本是文化的載體，撇開專業和實用的層面說，大學生也應該有相當高的語文水平，不然就不容易作深入有創意的思考，也不能認識傳統和當前的文化動向，更無從掌握外在世界的脈搏。

不過，在今天的體制和環境之中，學生在大學修讀語文的空間極其有限。下面試提出三點原因。

原因之一，是香港各大學都採用三年制，修習專業以外學科的時間和精力本來就極其短缺；原因之二，是每一學科的知識，日益膨脹，在大學負責行政的學者，關心學生的專業水平多於其語文能力，結果是一般學系不大願意把提高語文能力的措施放在最優先的位置；原因之三，是不少人認為語文訓練本是中小學和大學預科的任務，學生要是在小學六年、中學五年、預科兩年中，每星期上好幾節語文課都還沒有學好，則在大學修習一些為期十二三周的課程就能突飛猛進，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不主張在大學的語文教學投入太多資源。

上述的客觀困難不容易消除，行政人員的考慮無疑也相當切實。因此，在大學從事語文教學設計者，只能積極面對困境，尋求適當的出路。

五六十年代，香港不少大專院校開設大學國文課程。此科一般宗旨在於全面提高大學生閱讀（包括古今典籍）和寫作（包括文藝創作和實用文體）的能力，乃至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認識和修養。當時的教材，以中國文學和學術上的經典之作為主。到了七十年代，大家覺得大學國文科的目標可能定得過高，不少學生運用現代書面漢語還不能得心應手，遑論掌握文學和學術源流，於是選材力求切於時用，設計也逐漸趨向於現代語文教學的模式。在轉變期間，不免有學者仍然主張大學國文科應該強調文化學術承傳的使

命。文化承傳和語文訓練的論爭，可說一直相持到八十年代之末。踏進九十年代，香港的大學教育發展迅速。六十年代以還，香港只有兩所大學。九十年代之初，先開辦了科技大學，而原來的大專院校，也陸續正名為大學。及至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香港的大學已增為八所，學額有高速增長。還沒有正名為大學的院校，目前也開設學位課程。這些年來，大學課程錄取的新生水平參差，是毫不足怪的，而語文訓練的迫切，更不待言。又在香港回歸前後，教育工作者深感香港的大學生對中國文化應該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不少大學都加強了文化素質教學。語文教師當然知道文化與語文息息相關，但在教學上不妨各自有其目標，既不矛盾，反而可以互為補足。因此，到了九十年代後期，大學的語文教學趨向於功能化，已經是明確的方向。

早在九十年代初，香港大專院校的語文教學工作者舉行了一個座談會，會中交流了各院校課程和教學情況，也交換了教師的心得和意見。座談會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和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語文研究中心合辦，一九九一年五月四日在中文大學舉行。座談紀錄發表於《中國語文通訊》第十四期（一九九一年五月出版）。當時與會學者，沒有人不認同文化修養的重要，而就有關資料所見，各院校的課程設計，都傾向於功能化，總的目標是培訓學生日後應付各行各業語文上的需要。

綜觀整個九十年代，香港大專語文教學都朝著這個方向設計，走向專業化、功能化，開設行政事務中文、法律中文、商用中文等等實用科目。當然，推行專門或專業語文教學最大的困擾，是在學生語文基礎還沒有穩固之際，卻要在短短一學期十餘周之內提升他們在某方面的語文運用能力。有經驗的教師，都知道這不是容易的任務，但在客觀上，也不可能要求所有大學生都修習一兩門基礎課程，先全面打好語文基本功，然後進而培訓他們應付專業上的需求。

今天在香港的大學從事語文教學工作者，既要面對有限的資源和教學時數，更要照顧學生的語文水平和需要，而學生的學習動機一般不高，校內校外的壓力卻不斷增加，其任務之繁重、工作之艱巨、責任之重大，可以想見。事實上，香港各院校的中國語文教師，都盡了最大的努力。我們對香港大學生的水平儘可有種種不滿，但教師的貢獻，是應該先獲肯定的。過去十年，各大學都從事語文課程修訂，通過檢討、研究，提出了不少新意念，推行了不少新計劃。這些工作，成為香港大專語文教學邁進二十一世紀的基礎。

就在九十年代之末，香港回歸之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系舉辦了「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研討會在一九九八年五月舉行，主題是「因材施教與學以致用」，尤其針對世紀之交的香港大專語文教學問題。參與的學者，包括了香港所有大學的中國語文教學工作者。這是前述九一年中大舉行座談會以後的一次重要交流。相隔差不多十年，大學生的情況和學習環境不無改變，下面試略加分析。

在課程方面，教育當局於九十年代設立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供所有預科生修讀，為期兩年。這一科的合格成績，是香港所有大學的入學條件。按理說，在預科修習兩年中文，應該很有效益，但近年香港各界對大學生的語文水平，卻是嘖有煩言。平心而論，大學生水平參差的情況跟過去沒有兩樣，能力強的學生不見得就消失了，但力有不逮者的絕對數字，不免大大增加。香港社會到了世紀之交，低技術行業基本已受淘汰，經濟愈益倚重金融、資訊及其他高科技服務行業，而許多專業如法律、會計等以往專用英語，今天不得不兼用漢語。這些因素，顯示了社會對有相當高中文水平的人材需求有增無已。語文教師身處這樣的環境，加上十年來資訊科技突飛猛進，對語文教學提供了許多新的可能性，教學不可能不利用這方面的資源，因此可以說，到了二十一世紀，語文教師面對的不但是個新時代，而且是個新世界。

就這次研討會發放的論文觀察，今天在大學從事語文教學工作者，都意識到這樣一個新世界。我們經過考慮，把研討會的論文以論文集形式作為專書出版，定名為《跨世紀的大專語文教學》，此舉既有學術價值，並可供新世紀的香港大專教師參考，自是饒有意義的事。

《跨世紀的大專語文教學》全書分為六個單元，共收二十二篇論文。

第一單元是宏觀分析。陳烜之教授有關語文與認知的研究為語文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對語言行為深入的分析，可以作為教學設計的基礎。李學銘教授針對因材施教與能力轉化的問題，根據豐富經驗提出了教學上應有的關注。培養大學生自學是今後語文教學的重要方向，楊鍾基教授就因材施教與學以致用兩方向，探討了語文自學中心的發展。

第二單元是課程設計。李雄溪博士、楊靜剛教授、康寶文博士三篇論文，或就香港大專中文課程設計提供了建議，或就某學科教學總結了經驗。有關的討論，都以因材施教為前提。

第三單元是探討行業語文和社會要求的論文。鄭滋斌博士和郭素娥、袁燕萍兩女士的論文都涉及法律和語文問題，香港法律界過去全部用英語處理事務，到接近九七年才開始有限度地使用中文，但中文的重要性肯定在未來大為提高，因此大學的語文教師對這個問題不得不加以關注。陳月紅教授的論文探討香港各行業對大學畢業生中文能力的評價及要求，可以反映教師對「學以致用」問題的關心。

第四單元包括三篇關於教學法和教學經驗的論文。周漢光教授論如何培養想像力，曾志雄博士探討如何利用同義詞進行教學，都根據實際經驗立論，何萬貫教授和歐佩娟女士的合作研究，針對大學中文系教學方法的取向，切合研究會主題。

第五單元是教材和教學媒介的探討。羅婉薇女士和李志明先生提出自學課程的教材設計，與第一單元宏觀分析中的意見互相呼應。梁建輝先生提出網上教學的構想，蔣平教授對多媒體普通話教材的分析，回應了資訊時代教學方式革新的需要，預計這方面的

嘗試未來會更為積極。

第六單元論文的數量最多，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跨世紀的語文教學問題，涉及網上教學資源、報刊語文分析、語法與寫作教學、母語讀音掌握等範圍。蔣英豪教授的論文析論萬維網上的中國韻文教學資源，梁巨鴻先生分析報章標題的語言特點和語文學習的關係，巢立仁博士提出如何應用圖示法於語法教學，孫愛玲博士分析大專生運用語彙及語法的混淆現象，樊善標教授討論方言詞與規範詞的關係，李貴生博士則從後設語言看邏輯與寫作的關係，都結合了理論和實際學習情況論析問題。何杏楓教授和陳雄根教授通過具體調查研究中大中文系一年級學生粵語讀音，顯示了學生掌握母語語音的情況。

這本論文集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同人組成編輯委員會負責編輯事宜，承蒙崇基學院出資出版。按照崇基學院的原則，一切學術性書刊必須經嚴格審查，每篇論文以隱名方式送校外專家審定，這也符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出版程序。本書的審查由崇基學院出版委員會設立的審查委員會負責，每篇論文都經兩名專家通過，如專家意見分歧，則由第三位專家審閱，因此本書是經學術審定的論文集，不同於研討會論文及資料匯編。這裏特別感謝崇基學院李沛良院長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陸國樂社長及社內諸先生的合作。又學院的徐志宇先生任審查委員會秘書，投入大量精力，實可感銘。

論文集在二十一世紀之初出版，正好作為跨世紀大專語文教學的參考。估計在新世紀，語文教學工作者仍然要面對許多新問題、新挑戰，然而憑著教師過去多年的專業精神，加上不斷向前探索的態度，深信香港的大專語文教師，在未來的教學有更光輝的成績。

二零零零年冬序於沙田